

文章编号: 1673-0453(2015)01-0046-07

论海明威的巴黎情缘

张媛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3)

摘要: 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大都有着海明威生活的深深印记。《流动的盛宴》记录了海明威在巴黎度过的青春年华,记录了他人生的多个开端,记录了他的奋发进取,记录了他的落魄与成功,其中充溢着海明威的巴黎情怀。《太阳照常升起》属于半自传体小说,作品的主题带有巴黎生活底色,主人公的原型是作者在巴黎“认识的人”,情节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具有互文性,场景是作者生活过的巴黎场景。海明威的这两部作品或显或隐地反映了他与巴黎结下的情缘。研究海明威的作品,最好结合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展开研究。

关键词: 海明威;《流动的盛宴》;青春记忆;《太阳照常升起》;巴黎情缘;巴黎底色;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流动的盛宴》是海明威的一本回忆录:“讲的是他1921—1926年在巴黎度过的岁月。”^[1]这说明该书对研究海明威生平、对研究其作品的巴黎印记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但中国学术界对此却很少关注,查“中国知网”,仅有一篇针对《流动的盛宴》三个译本进行评析的论文^[2],对于《流动的盛宴》与海明威其人、其作品关系的相关研究还是空白。笔者拟从《流动的盛宴》入手,探究海明威1921—1926年在巴黎的生活,进而探讨这段生活对海明威半自传体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及其他作品的影响。

一、《流动的盛宴》与海明威的巴黎情怀

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是文艺理论的基本常识。中国文论讲究“知人论世”,即研究作品一定要对作家的生活、思想、价值取向有所了解,研究海明威作品更应该如此。与一般作家相比,海明威的作品带有更为强烈的作家本人生活印记,如《太阳照常升起》属于半自传体小说,《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属于自传体小说,而尼克·亚当斯的故事“模型是作者自己”^[3]。海明威传记作家库·辛格曾说:“谁想了解海明威的为

人,谁就得了解作为作家的海明威。他的世界包含在他写的书里,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真实的,都是他认识的。”^{[4]53}从这个角度而言,《流动的盛宴》在研究海明威其人与其作品的互文性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流动的盛宴》是海明威1957年秋天开始在古巴写作、1960年春完成初稿、1960年秋又做出修改的一部回忆早年在巴黎生活的作品,也是海明威亲自修改付梓的遗世之作。巴黎一直是海明威魂牵梦萦并屡屡提及的城市,1921—1926年,海明威任《多伦多明星报》通讯记者,驻足巴黎,遍历希腊、土耳其、瑞士、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因此海明威对巴黎情有独钟、始终不能忘怀:“每一个在巴黎生活过的人,对巴黎的回忆都不会和其他人相同。我们常常重返那里,不管我们是谁,也不管她怎么变化,也不管我们回去是难或是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地方,无论你给她带去的是什么,你终会得到回报的。”^{[1]195}海明威自在巴黎登上文坛开始,就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中心^[5]。巴黎是他文学创作生涯的起点,是他与众多作家同行纯真友谊的发端之地,更是他纯真浪漫爱情的发源之所:巴黎象征并见证了他青春年代的意气风发和甜蜜爱情。甚至可以这样说,《流动的盛宴》记录了海

收稿日期: 2014-11-27

作者简介: 张媛(1973—),女,重庆人,江苏科技大学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赛珍珠研究和英美文学及理论研究。

明威人生的多个开端，记录了海明威在巴黎度过的难忘岁月，记录了他的奋发进取，也记录了他的落魄与成功。

首先，巴黎是海明威与许多著名作家友谊的开端之地。1921年12月，海明威夫妇途经西班牙前往法国巴黎，舍伍德·安德森为海明威开具了致格特鲁德·施泰因、西尔维娅·比奇、埃兹拉·庞德的介绍信。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使用一半以上的篇章回忆他与文艺界朋友交往的趣闻轶事，如格特鲁德·施泰因、埃兹拉·庞德、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欧内斯特·沃尔什、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帕散等等。对海明威来说，在巴黎期间最有价值、最值得回忆的是与格特鲁德·施泰因夫人的交往。作者用3篇文章回忆与格特鲁德·施泰因的交往（《施泰因小姐的指教》《迷惘的一代》《一个相当奇特的结局》）。格特鲁德·施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是一位长期旅居巴黎并在文学界有相当影响力的美国先锋派作家，居住在花园街27号，虽然早已成名，却不吝提携后辈。她“一直对我们亲切友好”^{[1]11}，“对待我们就像我们是十分听话、很懂礼貌并且前途无量的孩子们似的”^{[1]12}，“后来我又受邀冬季下午五点以后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1]14}，因此海明威“习惯于路过时到她的工作室逗留一会儿”^{[1]14}，因为她有“我们热爱的挂满名画的工作室”^{[1]11}，“她向我介绍现代派绘画和画家的情况”，并“向我展示她的好几卷原稿”^{[1]15}。对于海明威的读书、创作，施泰因更是悉心指教并提携。她指导他读书：“你要么读些真正的好书，要么读些显而易见的坏书。”^{[1]22}“你为什么要读一个死人的东西呢？难道你看不出他是个死人吗？”^{[1]21-22}她指导他的创作：“你不应该去写任何不能出去示人的东西。那是没有意思的。这种做法是错的，也很傻。”^{[1]13}相处几年之后，他们之间甚至谈到性、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等禁忌性问题^{[1]16-19}。对海明威作为20世纪20年代时代代言人声誉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施泰因夫人提出的“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you are all a lost generation)”：“我们从加拿大回来以后……她提出了‘迷惘的一代’的说法。”^{[1]25}“你们所有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你们是迷惘的一代。”“你们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们一个个醉到死……”^{[1]26}

另外一位对海明威创作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是同属“迷惘的一代”旗手阵营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海明威同样用3篇文章回忆与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交往（《斯各特·菲茨杰拉德》《鹰不与他人分享》《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虽然海明威对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在生活上的可笑习惯不乏调侃，但对菲茨杰拉德的文学才能由衷佩服：“他的才能犹如蝴蝶翅膀上的细粉形成的图案那样自然。”^{[1]128}“读完这本书（《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明白无论司各特做了什么，也无论他的表现如何，我必须明白那就像是生了一场病，我必须对他尽量伸出援助之手，竭力去做他的一个好朋友。”^{[1]160}“一九一五年的秋天……我不愿把《太阳照常升起》初稿的手稿拿给他看”^{[1]168}，他因此很不高兴。但《太阳照常升起》得以顺利面世，菲兹杰拉德功不可没，正是在菲兹杰拉德的建议和推荐之下，斯科利布纳父子出版公司才同意出版此书。自1926年始，海明威所有作品都由斯科利布纳公司出版发行。

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还回忆了与其他流寓巴黎的文人之间的交集：回忆了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的深交（《埃兹拉·庞德和他的才智之士》《一个邪恶的特工人员》），回忆了与欧内斯特·沃尔什的往来（《一个打上死亡印记的人》），回忆了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邂逅（《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魔鬼的门徒》），回忆了与帕散的相遇（《与帕散在园顶咖啡馆相遇》）。叙述虽然或详或略，不乏八卦，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第二，巴黎是海明威文学创作生涯的起点，成就了海明威的文学梦想。海明威是带着梦想来到巴黎的，旅居巴黎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虔诚、最谦恭、最坚忍、最勤勉的时期^{[6]28}。巴黎是个宽容的城市，同时又是欧洲文明的集大成者，加之与生俱来的文化情调、浪漫气息，特别适合文化界和文学界人士的生存。战后的英美文化青年都把去巴黎学习看作时尚之举。巴黎也是海明威学习创作的“社会大学”和滥觞之地，更是他进入文学界进而很快成熟起来的关键场所^{[6]28}。在《流动的盛宴》中，不少篇章描写了海明威的梦想与在巴黎的漂泊生涯——在困窘的生活中追求自己的写作梦想。《莎士比亚的图书公司》《饥饿是很好的训练》

① 笔者注，这里的死人指的是奥尔德斯·赫胥黎。

《在丁香园咖啡馆》等文章记叙了海明威常去奥德翁路12号“莎士比亚图书公司”租借图书的相关情况：“在那些日子我没钱买书，于是我就从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出借书籍的图书馆借书看。”^{[1]29}“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比她（图书管理人员西尔维娅·比奇）待我更好”的人^{[1]29}。在没有付押金的情况下，她相信我并告诉我多借些书也可以，当来到她的书店时甚至连“饥饿感也被抑制了”^{[1]58}。海明威挑选经典作家的作品研读。这些经典作家大都以俄国作家为主，比如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安东·契诃夫等，他们的作品深深地影响了海明威的思想和创作。另外海明威也阅读当代英美作家的作品，比如D. H. 劳伦斯的作品，并从中切切实实获得教益。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其令海明威佩服、着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有些事是不可信的，有些事是不可思议的，但有些又写得特别真实，读的时候会使人产生变化，其中的邪恶与圣洁、脆弱与疯狂以及赌博的疯狂性都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了解——就像读者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了解到军队的调动、地形、军官、士兵和战斗等情况，从屠格涅夫的作品了解到如画一样的景色和大路的情况^{[1]113-114}。海明威一生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形象而诙谐地用球赛、角斗、拳击的专业用语比较自己与对方在文学创作上的孰高孰低：“又来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我较量，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谁也打不上三个回合……”^{[7]267}，海明威忠实记录了自己努力写作以实现创作梦想的情况：“我一定要勤奋工作了。工作差不多能治愈一切。”^{[1]19}“我知道必须写一个长篇……”^{[1]65}“我经常写一个段落就花去整整一上午的时间。”^{[1]137}这些独白真实记录了海明威的自我鞭策。一定的时空距离有利于作者的创作，远离美国本土的巴黎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创作之地：“人们常说的把你自已移植到另外一个地点。我想这对人或对其他不断成长的事物来说，可能都是必要的。”^{[1]4}在经年累月的创作生涯中，海明威不断积累、成熟，明白了个中道理。

第三，巴黎的生活为海明威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描写了巴黎生活的方方面面：巴黎有业余咖啡馆这种藏污纳垢的地方^{[1]2}，也有圣米歇尔广场上的好咖啡馆可以忘我写作：“我在这个故事中陷得太深了，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迷失了。”^{[1]5}塞纳河畔不但有一个个书

摊，还是垂钓的好地方：“有了钓鱼人和塞纳河上的生活……这一切都让我沿着河岸散步时从来就没有孤独的感觉。”^{[1]38-39}巴黎的春天则可以和妻子一起去看喜欢的赛马，此时此地的一切都让海明威感觉亲切：“我们看着，一切都在眼前：我们的河，我们的城和我们城里的这座小岛。”^{[1]48}当然，巴黎困窘的生活同样给海明威留下深刻难忘的记忆：“饥饿对健康有利。饥饿的时候，名画看起来就更有味道。不过，吃饭也是很美妙的，就在此刻你知道到哪儿去吃饭呢？”^{[1]61}“巴黎是座古老的城市，而我们都还很年轻，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简单的，贫穷、意外之财、月光、对错以及月光下睡在你身旁之人的呼吸，都不简单。”^{[1]50}海明威从生活中领悟到“简单即美”的真谛。“好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海明威给朋友写信时说，他和妻子哈德利就像两个性急的密探那样沿街巡视，他们在拿破仑的墓边徘徊，在塞纳河畔一个挨一个的书店里浏览，在卢浮宫没完没了地细细参观，在街头小饭店里一边吃牛排烧土豆，一边学法语^[8]。诸如此类看似琐碎却必不可缺的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为海明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诚然，就像海明威自己所说：“作者有足够的理由在本书中略去了许多地点、人物、观感和印象。其中一些是秘密，一些是众人皆知的。”^{[1]前言}譬如，自1923年到1927年，海明威每年都与朋友去西班牙纳瓦尔省潘普洛纳观看“圣费尔明节”^{[9]173-175}。这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盛会，其中最为重要的活动是观看斗牛，但这只在《流动的盛宴》中被略微提及：“在生活上我们还是很节约的，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我们绝不乱花钱，以便攒点钱好在七月份去潘普洛纳参加那里的狂欢节，随后去马德里，最后去巴伦西亚参加狂欢节。”^{[1]137}而在《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半自传体的小说中，对这次活动则有详细而真实的记载。

1957年海明威最后一次造访巴黎，依然下榻年轻时最钟爱的丽兹酒店，回国后即撰写《流动的盛宴》，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在巴黎度过的这段掺杂着苦涩与甜蜜的美好岁月。总体而言，《流动的盛宴》对于巴黎生活的记载是有选择的，是晚年的海明威对青年时期在巴黎生活的回望，那里有海明威的青春、梦想、奋斗、生活、爱情，还有名人八卦：“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余生不论你在哪里，它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1]扉页}

二、《太阳照常升起》的巴黎底色

海明威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这是读者阅读海明威作品时的共识。海明威曾说自己在巴黎学会了写作，这为他初期的小说提供了灵感^{[10]92-93}，在巴黎度过的岁月无疑对海明威成长为杰出作家起到了显著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通观他的短篇小说全集，在短篇小说中明确以巴黎为背景的却寥寥无几^{[11]4}。在《流动的盛宴》的序言里，海明威有些无奈地提到，他本来有不少题材，有些是可以写成短篇小说的。当然，海明威1921—1926年在巴黎的生活并非完全雁过无痕，一些人物、事件、心绪仍然在他日后的作品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他的不少作品都带有巴黎生活底色，《太阳照常升起》是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一部。海明威“曾经创造过几百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但是最伟大的人物还是在书中用了假名和伪装的海明威本人。他的全部创作中最伟大的故事还是海明威自己过的那种生活，因为他比他的主人公更坚强，更富有色彩。”^{[4]195}笔者拟结合《流动的盛宴》和相关历史资料，分析海明威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保留的巴黎底色和作者过往生活印记。

首先，作品的主题明显带有巴黎生活底色。翻开《太阳照常升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句题辞：“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引自格特鲁德·施坦因的一次谈话。”^{[12]1}这也是海明威为了使新作得以顺利出版使用的宣传手段^[13]。但海明威对格特鲁德·施泰因的这种定义并不完全赞同：“让她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之类和所有随便贴上去的肮脏字条见鬼去吧。”^{[1]28}其桀骜不驯的个人主义者形象跃然眼前。也有学者认为：“海明威在巴黎学艺期间的确与斯泰因来往很多，也主动求教过她，但当时对他创作影响更大，甚至影响到后来创作的是诗人埃兹拉·庞德。”^{[9]3}1924年，正是通过埃兹拉·庞德的引荐，海明威得以结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时任《大西洋评论》杂志的主编。由此，《大西洋评论》开始刊登海明威的小说。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太阳照常升起》在读者接受层面明显受到格特鲁德·施泰因提法的影响。中西学界一般认为，《太阳照常升起》是表

现“迷惘的一代”诸多作品中的执牛耳者，海明威由此成为所谓“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旗手和代表作家，作品在当时和日后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五十部美国小说》的论述中，英国学者伊恩·乌斯比曾指出：“在问世之日，这部小说轰动一时。正如马尔科姆·考利在《流亡者归来》（1961）一书中所证实的那样，它掀起了一股‘热’。”这股热潮盛极一时，成为当时年青人争相追捧的时尚：“小伙子试图像书中男主人公一样喝得酩酊大醉而泰然处之；正经人家的姑娘也像女主人公那样以令人心碎的方式结交一个又一个情人。他们说起话来都和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一样。”并且认为，《太阳照常升起》“对研究‘迷惘的一代’的学生来说，它仍是一部重要的教材”^[14]。库·辛格甚至认为《太阳照常升起》“是《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主题的另一写法”^{[4]82}。《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一般翻译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英国作家D. H. 劳伦斯的作品。在《流动的盛宴》里，劳伦斯的作品曾经是海明威和施泰因夫人在巴黎讨论的对象：

“你现在还读别的什么人的东西？”

“D. H. 劳伦斯，”我说，“他写了一些很好的短篇，有一篇叫做《普鲁士军官》。”

“我试着读过他的长篇。实在读不下去。他可怜又荒谬，写起东西来像个病人。”

“我喜欢他的《儿子与情人》和《白孔雀》，”我说，“或许后一本要差一点。《恋爱中的女人》实在读不下去。”^{[1]22}

《太阳照常升起》的主题与劳伦斯的作品及思想的相关性，与海明威早年在巴黎读书的关联性，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二，作品的人物原型是海明威在巴黎“认识的人”。海明威曾反复强调：“不要寻找象征手法。你在《太阳也升起了》^①这本书里看到的人物是我描写的那种人。我认识的人。和我一起生活过的人。不要对我或我的书作心理分析。”^{[4]84}海明威研究权威库·辛格曾断言：“要了解海明威其人就必须了解他自己那个现实世界。”“要理解海明威就必须了解他那些真实的人物。”^{[4]85}小说里的“我”——杰克·巴恩斯是作家本人的化身，这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库·辛格提供的研究资料显示，开篇出现的另一主要人物“罗伯特·科恩的

① 笔者注：由于译本不同，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有时译为《太阳也升起了》《太阳照样升起》。

模特儿是海明威的一个老朋友哈罗德·洛布……洛布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和一份文学杂志的发行人。他在1925年卖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稿,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同依然默默无闻的海明威讨论写作技巧。同年,他和海明威一起到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参加斗牛节。”^{[4]83}有人把女主人公勃莱特·阿施利夫人^①与达芙·怀特斯登夫人划上等号,但多少显得牵强:“勃丽特女士是海明威认识的一些女人的混合体,其中包括哈德莉、那个风骚的巴黎女郎、艾洛伊丝以及其他许多曾经挽过他的手臂或咬过他的耳朵的荡妇。”^{[4]82}至于其他人物,有的研究者像索隐派一样,也搜索到了与之对应的原型人物。有人认为比尔·戈顿是以海明威童年时期的钓鱼伙伴威廉(比尔)·史密斯和他的朋友唐·斯图尔特两人为原型塑造的,弗兰西斯·克莱因是以凯塞琳·坎内尔为原型塑造的,迈克·坎贝尔是以帕特·格思里为原型塑造的。至于书中出现的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有研究者认为人物原型是现实生活中的“帕尔马小子”奥多涅斯。海明威与奥多涅斯父子都有比较深的渊源,耶塔诺·奥多涅斯被誉为“帕尔马小子”,是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著名斗牛士,其子安东尼奥·奥多涅斯作为子承父业的斗牛士同样享有盛誉,而海明威在另一部专门赞誉斗牛的小说《危险的夏天》中曾浓墨重彩地书写此人。

作品的主人公原型的确就是作者本人和与作者在巴黎“一起生活过的人”,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一本坦率的、根据真人真事所写的小说”。原型是互文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15]。海明威根据需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对原型作出或实或虚的变通,巧妙地在作品中表现了作家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第三,作品的情节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具有互文性。《太阳照常升起》的情节非常简单:小说讲述一群身心疲惫的美国青年经历一战创伤后流落、旅居巴黎及欧洲的故事,表现了这群美国知识分子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时所暴露出的绝望心情^[16],意在揭示人们在战后的精神荒原中挣扎求存的困境,突出“在虚无中抗争”这一主题^[17]。小说弥漫着现代主义者对于未来怀有的深刻悲观心理,同时又隐含着人类永不言败的战斗精神。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因在战争中脊椎受伤失去正常

的性爱能力,战后在巴黎任驻欧记者时与同样饱受战争创伤的勃莱特·阿施利夫人相遇、相知并相爱。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创伤不但表现在生理上,而且表现在心理上。战争剥夺了他们最珍贵的爱的能力和机会,他们心灰意冷,对生活感到失望、迷茫和厌倦,不得不以酗酒、吵闹、打架等扭曲行为来打发时日,寻求各种精神刺激。在百无聊赖中,他们联络几位朋友到西班牙省会潘普洛纳参加一年一度的斗牛狂欢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勃莱特·阿施利夫人迷恋上了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因此对一直苦苦追求自己的追求者罗伯特·科恩不屑一顾。但是勃莱特·阿施利夫人已经33岁,而佩德罗·罗梅罗只有19岁,两人年龄差距过大,勃莱特·阿施利夫人不忍心毁掉佩德罗·罗梅罗这个年轻人的前程,于是斩断情丝,重新回到巴恩斯身边。小说结尾,杰克·巴恩斯与勃莱特·阿施利夫人虽然“紧紧偎依”,虽然他们真诚希望“能在一起”,但他们心里其实都很清楚,他们彼此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海明威的人生经历与小说中杰克·巴恩斯的颓废漫游有太多明显重合之处:

书中人物都在有凭有据的背景下活动,其中包括蒙巴纳斯区的咖啡馆、西班牙的群山、斗牛节和生动的场面。有行动,有酗酒,有男欢女爱……还有死亡。^{[4]83}

海明威本人和其笔下人物杰克·巴恩斯皆属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患有时代的集体忧郁症。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海明威感受到世界的虚伪与虚无,力图通过表现这一代青年的幻灭来揭露这样一种虚伪与虚无^{[6]69}。

第四,作品的场景是作者生活过的巴黎场景。海明威在创作中特别强调地点感、事实感和背景感美学三原则中的地点感和地点意识,而且尤其偏爱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拉丁语系国家,对其中的浪漫之都巴黎更是情有独钟,“很少有作家能更简约而真实地记录去巴黎一家街角咖啡店进早餐所经过的街道”,海明威是其中的翘楚^[18]。《太阳照常升起》的那波利咖啡馆、雅士咖啡馆与《流动的盛宴》的业余咖啡馆、圣米歇尔广场上的好咖啡馆极为类似,甚至主人公在咖啡馆里见到和偶遇的人物性别、外形都极为相似:“我注视着——一个俊俏的姑娘经过我的桌子……”^{[12]15}“一个姑娘走

① 笔者注:勃莱特·阿施利夫人有的译本又译为勃丽特。

进咖啡馆……我看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异常激动……”^[1]这种种相似具有高度的互文性，彰显着作家海明威本人与其作品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方方面面的惊人相似度与吻合度。事实上海明威的个人经历更为复杂：结过4次婚，有过多位女友，从最初热血沸腾的理想青年伊始，历经磨难而成长，在内力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异化为一位堂吉诃德似的绝望而坚强的人生角斗士^[7]²⁶⁸，其充满激情与冒险活动的人生精彩纷呈，直至今日仍为世人津津乐道。

作家的创作实际是个人的内心独白，是个人生活经历经过主观意识再加工后在更高层次上的曲折再现。董衡巽先生认为海明威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拔高了的自传”^[19]。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太阳照常升起》的主题、人物、情节、场景，都可以看成是海明威一战后在巴黎个人生活经历的曲折再现。

另外，在海明威的著名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主人公哈里也曾多次回忆在巴黎的过往。他始终不能忘情于巴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反复询问身边的女人：“在巴黎我们住在哪儿？”^[20]⁶⁵其执着与忘我令读者动容。哈里对于巴黎城堡护墙广场更是了然于心，形形色色的人物混迹于此，其中有哈里熟悉的旅居巴黎贫民区的酒徒和运动员。酒徒借酒浇愁以暂时忘却贫困的逼迫，而工时缩短等生活条件的改善却使其愈加沉沦。相较之下，运动员们顽强坚韧，能够在贫困中崛起，在困苦中不懈追求。与运动员一样，哈里在贫困潦倒中奋发，在无望中追寻文学梦想，始终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原则，哈里形象的塑造无疑带有海明威本人生活的印记，在海明威的笔下，小说里的贫民区自然而然也成为哈里在巴黎最挚爱最难忘的地方：“你无法口授巴黎的那个城堡护墙广场”^[20]⁷⁷⁻⁷⁹。海明威以短篇小说和象征性背景的描写见长^[21]，他笔下的巴黎作为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符号带给读者无尽的遐思冥想。其他与巴黎有关的海明威作品包括《艾略特夫妇》《我老爹》等，但其中大都只有巴黎的浮光掠影。相较于作家同样钟爱并作为作品故事发生地频繁出现在各部小说中的意大利、西班牙、古巴、非洲等国家和地域，海明威很少创作直接以巴黎为题材的作品，就像哈里曾说的那样：“从来没有写过巴黎，没有写过他喜爱的巴黎”^[20]⁸⁰。其实，海明威很多作品都是在巴黎完成的，如《我们的时代》《春天的激

流》《太阳照常升起》，他隐身于巴黎这个理想的创作圣地，感受其开放自由的文化艺术氛围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人生领悟进行动态的、历时性的艺术创作，解读作品人物的精神归属并最终在人物身上达成结构性定格^[22]。

综上所述，海明威虽然在巴黎生活了很长时间，也对巴黎充满感情和留恋，但真正以巴黎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并不多，纪实性的《流动的盛宴》与半自传体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是真正可以算作以巴黎生活为背景的作品，而作为纪实性作品的《流动的盛宴》与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是存在着一定相关性和互文性的：《流动的盛宴》记录了海明威在巴黎度过的青春年华，记录了他人生的多个开端，记录了他的奋发进取，记录了他的落魄与成功，也让读者和研究者窥见了海明威文艺创作理论的形成路径与流程。《太阳照常升起》属于半自传体小说，作品的主题带有巴黎生活底色，主人公原型是作者在巴黎“认识的人”，情节与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具有互文性，场景是作者生活过的巴黎场景。研究海明威的作品，最好结合海明威的生平经历展开研究。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作家本人真实生活的深深印记。读者从《流动的盛宴》与《太阳照常升起》在时间节点、人物类型、事件安排上或显或隐的联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应该强调的一点是：不能、也不提倡将纪实作品与小说一一对应，因为小说毕竟是虚构的故事。从相对宽泛的意义而言，纪实作品指产生于现代社会的非虚构性叙事文学种类，强调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这一名称自19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已逐步被人们所接受^[23]。《流动的盛宴》可以说是海明威纪实作品的最典型代表，不少海明威传记作品都将其作为珍贵的史料予以采用。相较之下，小说为了增加情节的曲折性与趣味性，或者为了达成作家的创作目的允许最大限度的虚构。海明威大部分作品毋庸置疑仍属小说类别，只是海明威小说带有更为强烈的作家个人生活色彩，并在可能情况下和较大范围内与其真实生活具有关联性和互文性。正如海明威本人在第二届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开篇所言：“作家……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并且使之成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24]海明威身体力行对文学创作准则的理解，并以自己独树一帜的个

人风格在世界文坛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 [1] 欧内斯特·海明威. 流动的盛宴[M]. 合肥: 黄山出版社, 2011.
- [2] 迟红. 《流动的盛宴》三个译本评析[J]. 海外英语, 2014(14): 121-123.
- [3] 威廉·范·俄康纳编. 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M]. 张爱玲译. 北京: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1988: 198.
- [4] 库·辛格. 海明威传[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 [5] 杨仁敬. 美国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海明威研究[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2): 230-239.
- [6] 吴然. “硬汉”海明威——作品与人生的演绎[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5.
- [7] 徐葆耕. 西方文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8] 詹志和. 海明威[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5: 72.
- [9] 董衡巽. 海明威传[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8: 3.
- [10] 瓦莱丽·海明威. 和公牛一同奔跑: 我生命中的海明威[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 [11] 小查而斯·斯科里布纳. 出版者序[M]//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12] 欧内斯特·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13] 杨仁敬. 20世纪美国文学史[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0: 239.
- [14] 王问生. 海明威在巴黎的岁月[N]. 中华读书报, 2008-06-17(4).
- [15] 程锡麟. 互文性理论概述[J]. 外国文学, 1996(1): 72-78.
- [16] 王长荣. 现代美国小说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136.
- [17] 李淑春. 虚无中的抗争——海明威作品给人的启示[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 [18] 卡洛斯·贝克. 事物的本真[M]//杨仁敬. 海明威研究文集.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4-5.
- [19] 董衡巽. 海明威的启示[J]. 外国文学评论, 1989(2): 53-56.
- [20] 海明威. 乞力马扎罗的雪[M]//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21] 梁亚平. 美国文学研究[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57.
- [22] 刘明阁. 《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文本结构与主题分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6): 36-39.
- [23] 张琰. 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1.
- [24] 佚名. 美国作家论文学[M]. 刘保端译. 北京: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1984: 348.

(责任编辑: 喻世华)

On Hemingway's Predestined Affection for Paris

ZHANG 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Jiangsu 212003 China)

Abstract: In Hemingway's works the indispensable is the deep imprint of his life. *A Moveable Feast* records Hemingway's youthful days spent in Paris, his multiple beginnings in life, his perseverance, aggression and progress as well as his abjection and success. This novel is flooded with Hemingway's nostalgia and affection for Paris which can be easily and keenly observed. *The Sun Also Rises* is a semi-autobiographic novel, the theme of which is imbued with the base color of Paris life, with the prototypes of heroes and heroines being the writer's acquaintances in Paris, the scene being Paris scene the writer used to live in, while the plots and the writer's personal experiences are intertextual. These two works intrinsically and extrinsically reflect Hemingway's predestined affection for Paris. To do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Hemingway's works, it's advisable to carry out research in combination with Hemingway's life experiences.

Key words: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memories of youth; *The Sun Also Rises*; predestined affection for Paris; the base color of Paris; intertextuality